

新型媒介与近代中国的“知识传播”与“知识生产”

章清(中国 复旦大学)

这篇文章主要讨论的是在晚清中国近代知识成长的关键时期新型媒介所发挥的影响，以此揭示“知识传播”与“知识生产”的作用机制。近代知识在中国的成长乃“援西入中”的产物，涉及两方面的基本问题：西方知识怎样“传入”？中国本土如何“接引”？两种文化相遇发生“域外”与“本土”的知识调适，本不难理解，我们也熟悉“本土”所体现的为学立场，无论是“西学中源”，还是“中体西用”，皆深刻影响“采西学”的基本方向。^①因此对于近代知识成长这一问题，也有必要从多重视野予以考察。本文之所以结合“媒介”展开讨论，原因正在于，近代知识在中国的成长恰伴随新型媒介的兴起；新型媒介与近代知识构成高度整合的关系，西方的经验如此，晚清中国也不能例外。尤其是内中所展示的“知识传播”与“知识生产”的作用机制，更值得检讨。知识的成长从来不会以一种简单的方式进行“移植”，传统的“发明”，以及影响知识成长的诸多因素，皆构成重要的环节。对此略加梳理，或能帮助我们更好了解晚清近代知识在“传播”与“生产”方面展现的特色，也有俾更好把握近代知识的特质所在。

I. “媒介的历史包含了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域”

如何评估信息传播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早已构成审视近代世界诞生重要的视野，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与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即是常被引用的范例。前者揭示了在近世西欧社会，报刊、俱乐部、咖啡馆等场所催生出“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供人们讨论和争论公众事务；报刊乃“公共领域最典

^① 涉及近代学科知识成长的相关问题，此前已略有讨论，参见章清：《“采西学”：学科次第之论辩及其意义——略论晚清对“西学门径”的探讨》，《历史研究》2007年第3期；《“中体西用”论与中西学术交流——略论“体用”之辩的学科史意义》，收入《中国现代学科的形成》（中国近代史研究集刊第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型的机制”，可以清楚看出“公共领域政治功能的转型”。^①后者则致力于探讨“印刷资本主义”（print-capitalism）如何影响到民族概念的散步与流传，指明“印刷资本主义使得迅速增加的越来越多的人得以用深刻的新方式对他们自身进行思考，并将他们自身与他人关联起来”。^②这里无意套用上述理论进行某种证明，但立足于“新型媒介”的研究视野，确有不少值得借鉴之处。对近代社会重大历史现象的分析，往往都绕不开此。涉及“新教”的崛起，论者就道出并非完全是宗教的原因，“新教可以被视为由一种新的大众传播技术所引发的各种的分裂性潮流的综合体。”主要体现在“用一种新的、以印刷文字为基础的传播方式来代替传统的、在文字出现之前所采用的宗教传播方式。”^③

如何开展媒介的研究，也存在多样性的看法。不管怎样，涉及到“媒介”自应有这样的自觉，“媒介的历史包含了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域”，与大多数的人类活动相关，包括公共的或私人的。^④基于印刷术的诞生就催生了诸多研究成果。在《印刷书的诞生》一书中，“印刷书”即被视作“新一代的书籍”，还阐明印刷技术上的诸多发明，当然加速了书籍的生产，也为印刷世界中较晚近的产物——报纸预先铺路，报纸无疑即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见证印刷术对广大读者吸引力最典型的例子！”^⑤如论者所阐述的，这一尝试使得对印刷书研究的前景“豁然开朗”，书籍的历史从此“可以通过它与社会历史本身的联系加以理解”：构成经济史（生产条件、图书生产本身及其传播）、文化史（文本的结构、接受、交流和适应性），以及不同阶段的社会、政治的历史。^⑥彼得·柏克（Peter Burke）

^①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218页。

^② 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2页。

^③ 卡伦（Curran, J.）：《媒体与权力》（*Media and Power*），史安斌、董关鹏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92页。

^④ 让-诺埃尔·让纳内（Jean-Noël Jeanneney）：《西方媒介史》（*Western Media History*），段慧敏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2页。

^⑤ 费夫贺（Lucien Febvre）、马尔坦（Henri-Jean Martin）：《印刷书的诞生》（*The Coming of the Book*），李鸿志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序”，第1-6页。

^⑥ 弗雷德里克·巴比耶（Frederic Barbier）：《书籍的历史》（*Histoire du livre*），刘阳等译，

还重点讨论了知识和印刷品之间的关系，尤其是“销售知识”之“市场与出版界”，阐明到 1600 年以后开始发行的报纸和杂志，“是最足以说明资讯商业化的文学式样”，而且，“十七世纪的人已经视新闻为商品”。^①

关于《百科全书》，值得提及的是将此作为“启蒙运动的生意”描绘的巨著。它讲述的是一本书的“历史”，涉及的问题可谓层出不穷：启蒙运动是如何在社会中传播的？印刷品的物质基础和生产技术与它的主旨和传播有很大的关系吗？出版商、书商、推销员和文化传播中的其他媒介扮演什么角色？出版如何像生意那样运作？^②别的且不论，单就此书所展现的印刷商、工场主、出版商、读者的生活，就足可说明对于“出版物”的审视，“著者”之外，尚包括诸多环节需要厘清。这也成为“新文化史”研究关注的重点所在。如林·亨特（Lynn Avery Hunt）所强调的，“推动书籍史成为文化史的主流，在这方面没有人比得上夏尔提埃。”^③夏氏在《文本、印刷术、解读》一文中，即强调“想恢复其真正的复杂性，需要思索三个极点——文本本身、传达文本的客体、以及了解文本的行为——之间紧相结合的关系网络。”说明“文化史或可在文本批评、书籍史、以及文化社会学的交叉道上，找的一个新的区域。”^④

回过头来看围绕中国“出版物”的研究，也可谓方兴未艾。部分是受到哈贝马斯与安德森理论的影响及新文化史研究的推动，探究传播媒介与思想、政治、社会之间的互动，也构成中国研究的热门话题，并主要立足晚清书籍、报章的发展予以回应。*Late Imperial China*（《晚期中华帝国》）1996 年即曾推出“Publishing and the Print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晚期中华帝国的出版与印刷文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引言”，第 5 页。

① 彼得·柏克：《知识社会史：从古滕堡到狄德罗》（*A Social History of Knowledge: From Gutenberg to Diderot*），贾士兵蘅译，台北麦田出版社，2003 年，第 275-77 页。

② 达恩顿（Robert Darnton）：《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The Business of Enlightenment: A Publishing History of the Encyclopédie, 1775-1800*），叶桐，顾杭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 年，第 1 页。

③ 林·亨特编：《新文化史》（*The New Cultural History*），江政宽译，台北麦田出版社，2002 年，第 43 页。

④ 罗歇·夏尔提埃（Roger Chartier）：《文本、印刷术、解读》，收入林·亨特编《新文化史》，第 219-44 页，引文见第 227-28、244 页。

专号。^①稍后，多部专著也纷纷出版。^②内中所展示的研究趋向，已有论者有所总结，指出美国、日本及中国学界对书籍史的研究，已渐次超越印刷的“技术”层面，而越来越聚焦于社会与文化层面。^③中文世界也是如此。2005年9月台湾出版的《思与言》杂志，就推出了“近代中国的阅读、出版与文化”专辑。^④

这方面具有开拓性的工作，可举证李欧梵、瓦格纳（Rudolf G. Wagner）针对《申报》的研究。李欧梵较早就注意探讨晚清（也可能更早）以降读书人如何开创各种新的文化和政治批评的“公共空间”。指出晚清的报业和原来的官方报纸（如《邸报》）不同，它不再是朝廷法令或官场消息的传达工具，逐渐演变成一种官场以外的“社会”声音。瓦格纳则通过审视1877年间郭嵩焘与《申报》的“冲突”，检讨《申报》与英国官方、清政府三方面的互动关系。指明《申报》作为一种新媒介，将中国官场的一些事件进行报道，实际使权力机制与传媒机制产生了很微妙的关系。^⑤瓦格纳后来还组织了多位成员运用文化史的框架展开研究，强调文化是一种产业，是生产出来的，报纸也是一样，需要从报纸生产的物

^① *Late Imperial China*, Vol.17, No.1, June, 1996, pp.1-200。收录有弗里德曼（Friedman, Jill A.）、贾晋殊（Lucille Chia）、包筠雅、卜正民（Timothy Brook）、周启荣、贝尔（Bell, Catherine M.）分别撰写的六篇论文。

^② 主要包括：Kai-wing Chow, *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Cynthia J. Brokaw and Kai-wing Chow,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Christopher A. Reed, *Gutenberg in Shanghai: Chinese print capitalism, 1876-1937*, Vancouver, Toronto: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04.

^③ Tobie Meyer Fong, “The Printed World: Books, Publishing Culture,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66, No.3, August 2007.

^④ 除潘光哲所撰写的《导论》，还收录有这样四篇文章：孙慧敏《翰林从商：张元济的资源与实践》；李仁渊《新式出版业与知识分子：以包天笑的早期生涯为例》；周叙琪《阅读与生活：恽代英的家庭生活与〈妇女杂志〉之关系》；余芳珍《闲书消永日：良友图书公司与近代中国的消闲阅读习惯》，见《思与言》第43卷第3期，2005年9月。

^⑤ 李欧梵：《“批评空间”的开创——从〈申报〉“自由谈”谈起》，收入氏著《现代性的追求》，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3-22页。Rudolf G. Wagner, “The *Shenbao* in Crisis: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and the Conflict between Guo Songtao and the *Shenbo*”, in *Late Imperial China*, Vol.20, No.1, pp.107-138.

质前提（机器设备等技术条件）、生产者（报纸创办者、编辑者等）、发行渠道以及读者等进行分析，研究成果汇集为《加入到全球化的公共领域：早期中国报纸中的文字、图像和城市》一书。^①此外，针对单一媒介展开的研究也颇引人瞩目。1996年出版了讨论《时报》的专书——《印刷与政治——时报与晚清中国的改革文化》一书，^②2004年还出版了一部针对《申报》研究的专著——《一份为中国的报纸？上海新闻媒体的权力、认同和变化，1872-1912》。^③

聚焦于晚清中国知识的“传播”与“生产”，上述研究皆不无启发。不仅将“媒介”纳入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脉络中进行考察，也基于新的视野揭示报章的意义。指明任何出版物，皆与编辑、出版、印刷、发行以及阅读等诸多环节结合在一起，需要从多方面进行考察。本文结合新型媒介讨论近代知识的成长，自然须结合印刷、出版等机制展开。换言之，聚焦于新型媒介，正是试图揭示近代知识“传播”与“生产”与此的密切关联。依拙见，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场域”理论，或是了解近代知识的“传播”与“生产”尤其值得重视的分析框架。在布迪厄颇为复杂的理论体系中，“场域”（field）是贯穿始终的核心概念，如其所言，“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者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④将新型媒介理解为“场域”，并不为过。布迪厄和他的合作者本身发展了一种以“媒介场域”（mediafield）概念为中

^① Rudolf G. Wagner, *Joining the Global Public-Word, Image, and City in Early Chinese Newspaper, 1870-1910*,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2007. 其中费南山及论及《有用的知识和恰当的表达：十九世纪末中国的新闻生产》（“Useful Knowledge and Appropriate Communication: The Field Journalistic Production in Late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② Joan Judge, *Print and Politics: Shibao and the Culture of Reform in Late Qing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③ Barbara Mitler, *A Newspaper for China? Power, Identity, and Change in Shanghai's News Media, 1872-1912*,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④ 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华康德（Loic Wacquant）：《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33-34页。

心的新闻社会学研究新范式；“场域理论”已构成当前媒介批判研究的新范式。^①实际上，中国士人接触“新闻纸”，即据此获得关于外部世界的种种“知识”；走向报章之创办，也致力于使之成为“西学”之“载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晚清出现之报章也可定位于近代知识“传播”与“生产”的主要“媒介”。

II. “新闻纸”所构建的“信息世界”

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所开启的中西文化交流，成为“西学东渐”的滥觞，也构成审视近代知识成长的起点。此也提示我们注意，两种文明的沟通对“出版物”的依赖，再怎么估计都不为过，对比不同时期的文化交流，即可看清这一点。就传播知识的“媒介”来说，尽管耶稣会士也依赖于地图、仪器之类的新事物，但主要还是凭借“书籍”这样的“出版物”——当日中国读书人所熟悉的形态。当新一轮“西学东渐”的帷幕在19世纪揭开，情形便不一样了。继耶稣会士后，主要是新教传教士扮演着知识传播的工作，关键性的转变也发生了，那就是报章杂志、新式学校及学会等制度性传播媒介大量涌现，这也决定了西学传播的程度较之以往不可同日而语。在中文世界最早出现的一批报刊，即成为传递“新知”的重要窗口。1870年受浸礼会派遣来华的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就这样介绍报章：“泰西各国竞立报馆者何也？缘百年之内，各国所出新法，有益于教养者多，故先登报章，俾人周知，择善而从之也。”^②实际上，来华西人也将出版报章作为重要的工作，标举“广西国之学于中国”之“广学会”及《万国公报》，对于传播西学的作用，被证明是一种“强有力的酵素”。^③《广学会译著新书总目》就说明：“本会夙以振兴新学、开通民智为己任，创办以来，译印各书千百余种，此乃泰西名士奉为宝笈，人人必读之要书也，择其尤佳者，详录于后。”

^① 罗德尼·本森：《比较语境中的场域理论：媒介研究的新范式》，韩纲译，《新闻与传播研究》2003年第1期。

^② 李提摩太：《中国各报馆始末》，该文首刊于《直报》，又见《万国公报》第32册，1891年9月；又收入其所著《时事新论》卷一，1898年上海广学会印，第18页。

^③ 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下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5章“思想的变化和维新运动，1890-1898年”（张灏著），第313-23页。

首列即是《大同报》、《教会公报》、《女铎报》等报章。^①这里也试图首先说明，报章媒介何以构成“知识传播”与“知识生产”的主要载体。

何以传教士会选择当时称作“新闻纸”这一形式，原因并不复杂，在传教士的故乡这样的形式早已流行开来。令人惊奇的是，第一本在中国境内出版的中文杂志，即1833年8月1日郭实腊（Karl Gützlaff）在广州创刊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Eastern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对此已有颇为准确的把握。^②这些最早以“杂志”形式出现的“出版物”，是有别于传统书籍的新的出版样式，形式变了，也影响到知识传播的方式及具体的内容。那就是对“学”的阐述，更倾向于针对更广大的受众，《遐迩贯珍》、《六合丛谈》、《中西闻见录》、《中国教会新报》（后易名为《万国公报》）、《格致汇编》等，即是其中卓有影响者，成为述“学”的重要窗口，晚清士人也以此作为了解外部世界信息的主要渠道。

作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先时人物”，在林则徐、魏源那里尚未有办报之举动，但已建立起单向度获取信息的管道，“新闻纸”作为知识“传播”与“生产”的渠道由此也有所体现。还在1839年，身为两广总督的林则徐前往广州禁烟不久，便“日日使人刺探西书，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先后辑成《澳门新闻纸》与《澳门月报》。离任之际向奕山提供的建议还指明“夷情宜周密探报”：“夷人刊印之新闻纸，每七日一礼拜后即行刷出，系将广东事传至该国，并将该国事传至广东，彼此互相知照，即内地之塘报也。彼本不与华人阅看，而华人不识夷字，亦即不看。近年雇有翻译之人，因而辗转购得新闻纸密为译出。其中所得夷情，实为不少，制驭准备之方多由此出。”^③魏源的认知尤进一层，他曾感叹：“以通市二百年之国，竟莫知其方向，莫悉其离合，尚可谓留心边事者乎？”相应的也充分肯定了解外部信息的重要性：“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夷馆翻夷书始；欲造就边才者，必先用留心边事之督抚

^① 广学会编：《广学会译著新书总目》第1号，收入《近代译书目》，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667页。

^② 《新闻纸略论》，道光癸巳年（1833年）十二月出刊，此据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66、76页。

^③ 梁廷柵：《夷氛纪闻》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68-69页。

始。”^①在林则徐《四洲志》基础上编著而成的《海国图志》，其中所辑录的资料，即有对“新闻纸”的认知：“澳门所谓新闻纸者，初出意大利亚国。后各国皆出，遇事之新奇及有关系者，皆许刻印，散售各国无禁。苟当事留意挥阅，亦可觐各国之情形，皆边防所不可忽也。”^②该书的写作，更是利用了不少当时称之为“新闻纸”的信息，《后叙》中列出不少研究“西洋舆地”的著作，其中就包括有《每月统纪传》。^③所举证的信息也间有注明源自“新闻纸”的，有的则直接引用了《每月统纪传》的资料。此外，《海国图志》卷八十一至八十二之“夷情备采”，所录即是《澳门月报》，并注明：“道光十九年及二十年之新闻纸，两广总督林则徐译出，中有四条曾附奏进呈。”^④

在中文世界初创的一些报章，无论是来华西人所办还是中国士人所办，基于“中外通”的基本诉求，也大量汲取外国报章之信息，报章作为知识“传播”与“生产”的渠道逐渐拓展。1853年8月1日创刊于香港的《遐迩贯珍》，自第1号起即设有“近日各报”栏，选登世界各地的“新闻”（只是未明确标明“新闻”的来源）。1896年创刊的《时务报》，则安排了这样一些内容，“谕旨恭录”、“奏折录要”、“京外近事”、“域外报译”、“西电照译”等，尽管后来的栏目有所调整，但大体恪守这样的理念。按照研究者的分析，《时务报》的“域外报译”所选用的报纸，“既有译者自备，又有报馆出面借用或订购。大约采用了近四十种英文报，出版地包括英国、美国、日本、朝鲜和中国本土；三十种左右的日文报，九种法文报，七种俄文报和四种西班牙语报。”^⑤如加上必不可少的中文报章及书籍，则依托的资源更为可观。大致说来，从《时务报》开始，采辑其他报章及书籍的文字，包括西文、东文及国内书刊的信息即颇为普遍。1897年《经世报》创刊时刊登的“本馆告白”即说明“本馆英法各报，购自外洋，尚未寄到，暂就友人处借得数种及上海现有者译登。”^⑥1902年创刊的《新世界学报》，更是明

^① 魏源：《海国图志》卷一，上册，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第26页。

^② 魏源：《海国图志》卷五十二，中册，第1440页。

^③ 魏源：《海国图志》卷五十三，中册，第1458页。

^④ 魏源：《海国图志》卷八十一，下册，第1056页。

^⑤ 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85页。

^⑥ “本馆告白”，《经世报》第1册，1897年8月，第31-32页。

确指出：“本报自备东西各报数十种，以益见闻而广取资”；并且“广置东西专门书籍，请翻译二人译成，以供撰述者之采用。”^①

1904年发行的《时报》与《东方杂志》，算得上当时颇有影响的报刊，更将此特点充分显现。《时报》之“发刊例”就阐明：“本报设报界舆论一门，凡全国及海外，所有华文报章共六十余种，本报悉与交换。每日择其论说之佳者，撮其大意叙述之，使读者手一纸而各报之精华皆见焉。此亦各报馆之通例也。”同时，“本报设外论撷华一门，凡东西文各报之论说批评，其关于我国问题及世界全局问题者，则译录之，如报界舆论之例。”又表示：“本报设介绍新著一门，凡新印各书，每礼拜汇录其目，及出版局名，定价数目，其善本加以评论，以备内地学者之采择。”^②《东方杂志》更有着“杂志的杂志”之誉，其《简要章程》即说明“本杂志略仿日本太阳报，英美两国而利费 Review of Review 体裁，除本社撰译论说，广释新闻外，并选录各种官民月报、旬报、七日报、双日报、每日报、名论要件。”希望能实现“无力遍阅各报者，得此亦足周知中外近事。”^③

略说晚清以来报章之成长，可以看出其构成“知识传播”与“知识生产”的主要载体。在这个意义上，关注近代知识“传播”与“生产”的“场域”，也成为可能。这个“场域”，既包含着报章的编辑、印刷、发行所营造的“网络”；也包含着报章之编辑、读者及阅报处所构成的“网络”。显然这些因素都构成近代知识生产的基本要素，但其中的重点却有必要略加申说。报章自有其“生意经”，无论其定位如何，都有如何推销的问题。首先值得揭示的则是报章媒介对晚清社会的“介入”，而涉及知识的生产，不可回避的则是报章与科举考试的结合。

III. 作为“知识”载体的报章媒介

用不着特别指明，晚清出版的报章其色彩是多样的，其发展也经历诸多曲折，并非一成不变。分析新教传教士最初创办报章的活动，可以注意到这些报章所体现的是“教”与“学”的结合，相应的，对于现实生活的介入还是有限的。随后出现的《申报》与《万国公报》，则改变了这样的格局，影响自也不可相提并论。

^① 《〈新世界学报〉序例》，《新世界学报》第1号（壬寅第1期），1902年9月2日。

^② 《时报》发刊词，附“发刊例”，《时报》创刊号，1904年6月12日。

^③ 《新出〈东方杂志〉简要章程》，《东方杂志》第1卷第1期，1904年3月11日。

《申报》的创刊，代表的是商业性报章的兴起，也是对晚清社会生活更广泛的介入；由教会内部报章发展而来的《万国公报》，调整为直接以中国读书人为受众，同样是意味深远的转变。关键在于，这些报章往往都会刊登“邸钞”、“京报”之类的信息，甚至内容更为丰富。在这个意义上，近代报章之于“邸钞”实际上构成一种信息的“替代”，并且是以古代世界难以想象的方式汇集社会的各种信息。影响所及，晚清士人对外部信息的把握，也由“邸钞”转而接受《申报》、《万国公报》等报章所提供的信息。这其中，报章成为“书籍”的媒介，成为“知识传播”与“知识生产”的主要载体，即值得加以重点讨论。而且，重要的还在于，与书籍、书局相关的信息，往往都依托于报章这一媒介得以为更多人了解。甚至可以说，知识的“传播”与“生产”自有其“生意经”，报章的作用也甚为明显。

书籍与报章的联系，从时间上说并不算晚，来华西人所创办的报章就自觉进行这样的工作。《遐迩贯珍》曾连载过不少书籍，《六合丛谈》则有“新出书籍”一栏，《上海新报》则刊登有书籍告白。^①从时间上推断，裨治文（Elijah C. Bridgman）1832年5月在广州创办的英文月刊 *The Chinese Repository*（《中国丛报》），或许是最早登载这方面信息的报章。该刊从一开始就设有“书评”（Review）栏，介绍相关书籍，如第1卷第1号所介绍的即是 *Mohammedans in China*（《伊斯兰教徒在中国》）一书。^②这些对于书籍的介绍都起到重要的媒介作用，1872年发行的《申报》，更展示出书籍如何在报章媒介中得以呈现。

创刊约一星期后，《申报》即刊登有《招刊告白引》，强调“夫告白一事，俗之所不能免，而事事有相关者也”。内中还提及士人著述与之的关联：“士人著述宏富，欲供诸同志以流传四方者，往往求者不可必得，而著者无由遐布也。有新闻纸以告白之，而未见其书，先明其义，人人得而知之，其获益岂浅鲜哉。”^③随后，各书坊在报章刊登告白，即成为常事。《申报》第4号就刊载有尚义堂书坊启的“告白”：“本号常有四书五经、史记才子等书，并法帖字典之类发售，其板

^① 《中西闻见录》出版时即刊登有“告白”。见《上海新报》总第744号，1872年9月14日，第1版。以后一直连续刊登。

^② “Mohammedans in China”, *The Chinese Repository*, May, 1832, “Review”, Vol.1, No.1, pp.6-15.

^③ 《招刊告白引》，《申报》1872年5月7日。

十分清楚，倘贵客赐顾者，请至兴让街中便是，其价格外相宜，特此布启。”^①另一则“书坊告白”则说明：“本堂发售新旧各种书籍，并代客刻印装订劝善书，凡仕商赐顾者，请移玉于望平街三马路口本坊面议可也。”^②

除了为各书坊刊登“告白”，《申报》作为报馆从一开始也介入到书籍的出版中。1874年11月13日即刊登“访书告白”：“本馆现欲购求书籍数种，以图摆印。如有存藏者，幸即惠临敝馆，出示佳书，或则善价相偿，或则新书奉赠，悉凭尊意可也。”^③1878年3月7日《申报》又刊出《蔓书》启示，表示愿意出资征用并重刊士夫手中的珍本书、畅销书：“远近诸君子，有已成未刊之著作，拟将问世，本馆愿出价购稿，代为排印。抑或俟装订好后，送书数十或数百部，以申酬谢之意，亦无不可，总视书之易售与否而斟酌焉。”^④所征集的书籍，还包括读书人自行撰写的著作。可以说，除自行刊印书籍外，《申报》还走上为读书人刻印书籍之路。一则“代客印书”的“告白”就说明：“本馆可代客印书，即照字数定价，较之刻字，费亦更廉，且板字极明，印刷又甚捷便，如各书铺有赐顾者，请来面议可也。”^⑤大致说来，1872-1877年间申报馆大约出了50余种书，蔡尔康所撰写的《申报馆书目序》就说明：“迩日申江以聚珍板印书问世者不下四五家，而申报馆独为其创。六载以来，日有搜辑，月有投赠，计印成五十余种，皆从未刊行及原板业经毁失者，故问价之人踵相接也。”^⑥仅由《申报》提供的这些例证，便不难看出一家报馆往往在诸多环节都与书籍发生密切的关联。

《万国公报》的发行，因为与广学会建立起密切的关联，更提供了特别的例证，除了为其带来新的作者，于出版本身也产生重要影响。如花之安阐明的：“凡新出之书，则无论属于某家书肆，亦宜寄送一本于报馆观阅，方便告白。盖欲其书之远售，必资报馆之告白，乃能令人周知也。夫买书著书卖书，既各有所便，

^① 尚义堂书坊启：“书坊店”，《申报》1872年5月6日。

^② 千顷堂启：“书坊告白”，《申报》1872年12月19日。

^③ “访书告白”，《申报》1874年11月13日。

^④ 申报馆：《蔓书》启示，《申报》1878年3月7日。

^⑤ “代客印书”，《申报》1873年2月4日。

^⑥ 蔡尔康：《申报馆书目序》，《申报馆书目》，申报馆，1877年。此据周振鹤编《晚清营业书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177页。

则书籍易以流通，自足为学人博雅之助矣。”^①广学会的出版物，如花之安《自西徂东》、林乐知编译的《中东战纪本末》、《文学兴国策》、《五大洲女俗通考》，李提摩太编译《泰西新史揽要》、《新政策》，艾约瑟的《富国养民策》，李佳白《列国政治异同考》、《尚贤堂文录》，皆是在《万国公报》连载，然后再由广学会出单行本发行。同时，《万国公报》也承担着广告的功能，广学会的出版物，往往都在该刊进行介绍。^②别的且不论，1889年出版的《万国公报》第1册，就注明“墨海书局各书价目”，以“告白”的方式推销各书。^③正因为此，《万国公报》还成为买书人购书很容易想到的媒介，以至于有难以负担之感。^④

晚清读书人走向报章之创办，与书籍的关联也愈益密切，并且在多个层面都有所体现。内容方面，一份报章往往会以连载的形式刊登相关书籍的内容，这还不是主要的，作为一份报章实际搭建起一个销售平台，不仅其自身发行的报章与书籍需要借助其他的报章或书局，同时它也为其他报章与书籍的销售，担当重要的媒介。以《时务报》来说，即体现出报章的“销售”绝非单纯的“生意”。《时务报》的浮出水面，即是通过在《申报》上刊登告白实现的。1896年6月22日至24日连续三天在《申报》刊登的“新开时务报馆”的告白，说明了这样的意思：“今风会方开，人思发愤，宜广译录以资采择。本馆拟专发明政学要理及翻各国报章，卷末并附新书。坐落上海石路南怀仁里，择日开张，先此布闻。”^⑤

《时务报》在开办后，确实介入了不少这方面的工作，按照研究者的统计，“两年之间，时务报馆发售的译著约十余种。”^⑥这还仅仅是《时务报》自己出

^① 花之安：《自西徂东》卷四，“智集”，香港中华印务总局，1884年，第274页。

^② 关于广学会的出版工作，1901年出版之《广学类编》有大致说明。见唐兰孟编辑，李提摩太鉴定：《广学类编》，任保罗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03年第2版。

^③ “墨海书局各书价目”，《万国公报》第1册，1889年2月。

^④ 该报刊登的“告白”就说明：“近来托买书物者日见其多，本书院无暇酬应，即除稍添费用外，亦难分投各处代买，所以特具告白奉告诸处良友，本书院只有前名教会新报，今改《万国公报》，又覩见国地球国数种待售，余者请欲买者自向某处购某物某书，而且诸处之书向有存上海小东门外美化书馆，欲购者可以至彼買取，极为便当。”见“本书院谨白”，《万国公报》第7年第319卷，1875年1月9日。

^⑤ “新开时务报馆”，《申报》1896年6月22日至24日，第2版。

^⑥ 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第153页，作者还统计出“已写样尚无

版的书籍，更大宗的是代印、代售的各种书籍。该报第15册刊登的“本馆告白”，内中即有“本馆代售书目”，说明已建立起销售书籍的平台，销售的书籍包括：《天文地理歌略》、《钦定满洲源流考》、《钦定皇舆西域图志》、《传音快字》、《中国亟宜改革政法论》。^①第18册刊登的“本馆代售书目”，在此前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墨子闲诂》、《安徽全图》、《安徽舆图表说》等。^②除为其他书局“代售”之外，还承担为他人“代印”书籍的职能。第40册的“本馆告白”就说明：“中外通人如有新著或新译有用之书，向无刻本，愿交本馆付印者，本馆均可代办，印出后当奉赠二百部，如已有刻本，嘱为重印者，当奉赠百部。如系尤为精要之书，并可酌赠。”^③这也得到积极回应，一些读书人即表达了对此项工作有浓厚的兴趣，寄来了书稿，交由《时务报》代印、发行。《时务报》构成书籍销售的平台，绝非孤证，实际上，那个时候创办的报章，在与书籍的关联上，大致都走出了与《时务报》相似的一步，《知新报》、《湘学新报》、《经世报》、《新世界学报》等报章，对此都进行了有益尝试。由此，还推动报章与书局的合二为一。梁启超联合同道集股创办于上海的大同译书局，在时人眼中就看作是由《时务报》所开办的。^④这多少也说明外间对《时务报》的期许，也包含译书这一方面。吴樵对于如何办好《时务报》一直在发表意见，在一通信函中他就建议：“各处时务书、新译书，揭其纲领，大凡价值，何处可购，登报最好。”^⑤听到大同译书成立的消息，欧阳烜也表示：“贵馆近创大同译书局，尤为方今急务，译成一种，撰提要登报，所有译书遍寄通都大邑，由同志设肆发购……诸君子如此用心，功不在禹下矣。”^⑥

付印的书籍”和“已译未成各书”。

^① “本馆代售书目”，《时务报》第15册，1896年12月25日。

^② “本馆告白”，《时务报》第18册，1897年2月22日。

^③ “本馆告白”，《时务报》第40册，1897年9月26日。

^④ 大同译书局系梁启超联合同道集股创办，在《大同译书局叙例》中梁说明了创办书局的意旨。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1-72页。

^⑤ 吴樵：《致汪康年》（二十八），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521页。

^⑥ 欧阳烜：《致汪康年》（二），《汪康年师友书札》（三），第2891页。

与“学”的结合是晚清以降读书人创办报章值得注意的“生意经”，报章往往成为“述学”的重要媒介。无论是《时务报》，还是《知新报》，内中所显示的报章与书局的合作或许还是初步的，但由此所开创的报章与书局共谋发展的趋势，却是甚为显明的。《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报章，与书局的合作就更为紧密，甚至可看作推动报章与书局的发展，读书人已视作共同的事业。晚清究竟有多少书局，恐难以评估。据光绪三十二年（1906）上海书业商会所出版之《图书月报》第一期统计，当时已入会之书店有 22 家。迨清代末季，又有集成图书公司、中国图书公司、神州国光社等成立，约共 20 家。此外尚有公立机关、学术团体、报社、教会数十处，如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各省及学部官书局，京师大学堂、江南高等学堂、南洋公学、墨海书院、口学会、金粟斋、申报馆、时务报社、求是报社、求我报社、蒙学报社、益智公会、译书工会、尚贤堂等，亦相率编印图书。这里提供的信息颇值重视，那就是图书出版实际与杂志发行紧密结合在一起。一则出版机构广泛发行杂志，二则杂志社也印行图书。^①这样的趋向到后来还发展为书局也介入到报章的出版中，群益书社之出版《新青年》杂志，以及商务印书馆所出版的诸多杂志，都是典型的例证。重要的是，无论报章，还是书局，在晚清都处于不断成长中，成为传播西学或新学的主要媒介。读书人在与报章发生密切关联的同时，与新式书局也紧密结合起来。换言之，新式书局也成为晚清以降读书人新的安身立命之场所，构成另一种“生意”。

IV. 报章与科举考试的结缘

讨论了报章与书籍的结合，进一步的可以分析报章与科举考试的结缘。报章在多大程度上流通及阅读，往往与斯时的价值取向有密切关联，在晚清不得不提及的即是科举改制的影响，不仅许多书籍、报章的出版原本即有科举改制的因素，之所以能为士人所接受，进入其阅读范围，也是由于科举改制的影响。科举改制的核心体现在“废除八股，改试策论”，所出“策问”不少是围绕西学知识进行，考生则需要根据所掌握的西学知识才能完成“应策”的工作，这一分针凸显出凡是与“西学”、“时务”密切相关的书籍与报章，皆成为士子可能的选择。^②

^① 杨涛清：《中国出版界简史》，上海永祥印书馆，1946 年，第 20-21 页。

^② 这方面的讨论可参见章清《“策问”与科举体制下对“西学”的接引——以〈中外策问大

科举考试构成了帝国时代读书人晋升的阶梯，对于这样的大事，报章自然不能袖手。姚公鹤《上海报纸小史》即说明了科举考试也在借助报刊这一媒介：“清时科举盛行，每当直省乡试之年，则各报必延聘一科甲者于发榜之前，拟作江浙两省闱题文登之报首，以代论说。此风不知始于何时，其后乃相沿成例，盖举世为科举梦所浸灌也。”“此则报纸之用，本不在科举之末政，而影响反中于是，亦上海自有报纸以来之异闻矣。”^①全社会都在做着科举梦，报刊自然会借助这一平台。每逢乡试、会试期间，《申报》往往都会登载相关的内容，并出版供士子“揣摩”的资料。在《申报》所刊登的书籍告白中，不少即与这方面的内容相关。1873年7月26日刊出的“本馆告白”就说明：

本馆所编辑之时艺，标名文苑菁华，现已陆续付刊，四书文五百篇计至七月朔旦可以藏工，至发售各埠，则在江宁、杭州、武昌、福建四处，或自行派人代为零卖或趸卖于各处书店，倘有某处诸书店会议汇买若干部者，其价可来面议，且在本馆可立约。不在该书店发售省分，另行自卖也。^②

广学会及《万国公报》主要针对中国读书人展开工作，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广学会往往利用乡会试这一时机，向应考的士子赠书。《同文书会年报》第1号即报告了在1888年各省乡试期间分送了2,000册附有插图的《格物探源》，其中北京500册，南京500册，沈阳500册，杭州250册，济南250册，还将10,000册《自西徂东》交由南京的传教士，分发给当地考生。^③到1892年会试时，广学会又在北京分发了5,000册《中西四大政》，并在该年的报告中强调：“通过向聚集在帝国各主要科场的士人的指导，我们将触动不计其数的我们的追随者的心田。在一个省城的乡试科场上可以接触到一百个县的领袖们。”^④

观》为中心》，台湾《中研院近史所集刊》第58期，2007年12月。

^① 姚公鹤：《上海闲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31页。

^② “本馆告白”，《申报》1873年7月26日，第1页。

^③ 《同文书会年报》第1次，《出版史料》1988年第2期，第26页。

^④ 《同文书会年报》第5次，《出版史料》1989年第1期，第35页。唐才常在一篇文字中还说明，广学会在所赠送的书籍旁附注“考试时务揣摩秘籍”，还经常以“考试必读”

在报章的发行中，也显示出科举考试对于报章的销售有重要影响，《时务报》就提供了因为科举的原因为士子所接受的例证。黄遵宪致信汪康年就提到：“士子云集省会，似可每省酌寄一二百分，以期拓充。陕西一省孟符即可代办，可即寄百余分托渠。如他省照行，又可增印二三千分。”^①江标在给汪康年的信函中，也称道“报事想日有起色，湘中几致家弦户诵，且试者以之为兔园册，风气开辟一至于此，可喜也。岳麓院长王祭酒师，曾有劝阅《时务报》手谕，刻出遍给诸生，兹特寄呈一纸，大可刻入报中也。”^②在《时务报》创办前后，祝秉纲正参与科考，稍后在致汪康年信中也言及，“科举略有更改，当更可大兴也。”^③马凤岐在给汪康年的信中，则提到科举改制对推动报章之影响，“杭州署《时务日报》已改由楼处按日送，尊处可不必寄。《时务报》来甚迟，乞一察。现既变科举，足下所创两报，定必加倍风行，务当力宏此局，以裨天下，是为至要。”^④

这里提到的“科举改制”，值得略加申论。晚清科举改制颇经曲折，戊戌时光绪帝即曾下诏，规定乡会试：“第一场试中国史事、国朝政治论五道；第二场试时务策五道，专问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第三场试四书义两篇，五经义一篇。首场按中额十倍录取，二场三倍录取，取者始准试次场，每场发榜一次，三场完毕，如额取中。”重点说明，“嗣后一切考试，均以讲求实学实政为主，不得凭楷法之优劣为高下。”^⑤不过，戊戌时期所颁发的各项举措，大多未曾落实，政变后，一切概行停罢，科考也不例外。但所谓大江东流挡不住，1901年8月28日上谕又重申了戊戌时之意见。^⑥“其诏文用语，与戊戌年的罢时文之诏，几如出一辙。”^⑦既如此，对科举改制的反应，实际上包括两个时期，前一时期尽管未

字样招揽士人，称“凡熟读是书者，作为时务策论，隶事运典，信而有征”。见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唐才常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93页。

^① 黄遵宪：《致汪康年》（三十），《汪康年师友书札》（三），第2357页。

^② 江标：《致汪康年》（十），《汪康年师友书札》（一），第251页。

^③ 祝秉纲：《致汪康年》（十七），《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544页。

^④ 马凤岐：《汪康年》（四），《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600页。

^⑤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四），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4141页。

^⑥ 《清德宗实录》卷四八五，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十六日，见《清实录》第58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11-412页。

^⑦ 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35-36页。

曾落实，但其影响仍散布开来。这对于传播西学自有推动之功，也促成士子广泛阅读报章。

梁启超后来对此的总结就明确指明了这一点，说明八股取士导致新知之难以接纳，“尊其体曰代孔孟立言，严其格曰清真雅正”，其结果是“士人皆束书不观，争事帖括，至有通藉高第，而不知汉祖唐宗为何物者，更无论地球各国矣”。而废除八股后产生的实际效果，即是为接引新式知识广开门扉：“八股既废，数月以来，天下移风，数千万之士，皆不得不舍其兔园册子帖括讲章，而争讲万国之故，及各种新学，争阅地图，争讲译出之西书。”^①梁清楚点出了科举改革所具有的导向作用，“策问”正是接引新知的重要中介。李提摩太即道出改变之枢机所在：“本会刊书行世之始，未能显著效验。泊乎近岁，中国读书士子多知会中书籍之善，平居偶语恒盛称广学会不置于，起征深闭固拒之心，日渐融化。”还具体写道：“广学会于十年来，译著《自西徂东》、《泰西新史揽要》、《中东战纪本末》、《格物探原》、《时事新论》、《列国变通兴盛记》及《万国公报》诸书。（余书俱载书目，不能备述）初印时，人鲜顾问，往往随处分赠，既而渐有乐购者。近三年来，几于四海风行，……已足证中国求新之众。何况本会各书，屡遭书贾之翻刻，他省不及察，所察而知者，四川一省翻板至十有九种，虽属大干功令，而人多喜阅，实为信而有征。乃如此书，阅者愈多，求新者自日增而月盛。”^②

严复致张元济的一通信函，也特别指明科举改制后对译书业的推动：“科举改弦，译纂方始，南北各局执笔之士甚多。分以销售利益，庶有以泯其作嫁为他人之塞责，而动以洛阳纸贵之可欣求，达难显之情，期读者之皆喻；则此举不独使译家风气日上，而求所译之有用与治彼学者之日多，皆可于此寓其微权。”^③“改试策论”不仅影响于译书、出版业，更使士子受到极大的冲击。关键在于，此举提供了明确的信息，科举考试的内容将集中于测试士子对时务的把握，对西学新知的掌握。因此，对于科举改制无论赞同与否，准备继续参加科考的士子都将受此影响，去了解策论之格式体裁，以及可以取法之范文。士子所重视的不仅是西

^①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新政诏书恭跋”，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第2册，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第25-26页。

^② 李提摩太：《广学会第十一届年报纪略》，《戊戌变法》第4册，第216-21页。

^③ 严复：《与张元济书》，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544页。

学书籍，报章也是重要的选择。1902年乡试之际，《申报》一篇文章就注意到，应试士子中颇有“好为知新者”，往往“矜奇吊诡，刺取《新民丛报》及近人所译和文诸书中各字而诋诃自得。”^①次年《申报》又登载了这样的文字：“自制艺改为策论，朝廷恐多士之仍拘旧习，不足以得博鸿之才，……而多士之闻此风声者，相率沟取新出之译本，新印之时报，并不研求其中之意义，惟掇拾字面以助行文，炫异矜奇，莫可究诘，一若不如是不足以见新理新学者。”^②

姚公鹤《上海闲话》描绘了科举改制后引起的种种异动，“当戊戌四五月间，朝旨废八股改试经义策论，士子多自濯磨，虽在穷乡僻壤，亦订结数人合阅沪报一分。而所谓时务策论，主试者以报纸为蓝本，而命题不外乎是。应试者以报纸为兔园册子，而服习不外乎是。书贾坊刻，亦间就各报分类摘抄，刊售以侔利。盖巨剪之业，在今日用之办报以与名山分席者，而在昔日则名山事业且无过于剪报学问也。”^③包笑天《钏影楼回忆录》则讲述了遭逢中日甲午之战的青年人所产生了种种变化。向来莫谈国事的读书人，受到震动，也要与闻时事，思考读书人除了八股八韵之外，是不是还有其它应该研究的学问。于是“常常去购买上海报来阅读，虽然只是零零碎碎，因此也略识时事，发为议论，自命新派。也知道外国有许多科学，如什么声、光、化、电之学，在中国书上叫做‘格物’，一知半解，咫闻尺见。”^④高风谦的例证还说明，其乡居授徒，也有赖于从《时务报》获取基本原料。他在给汪康年的信中就提到：“风谦早年治举业，亲没之后，便无意科名。虽三年一试，与俗浮沈，而时文试帖，久置度外。乡居授徒自给，间以中外时局及格致之理，与诸生相讨论，见闻寡陋，良用自歉。其西土（士）翻译各书，文章多不足观。近得贵报，始有所藉乎？”^⑤

这还只是旁观者的观察，具体到以科举为敲门砖的士子，也有诸多例证说明“改试策论”所产生的影响。章锡琛出身于乡间经营小商业的一个家庭，“从9岁便起首学习考秀才所必要的八股文”。“后来清廷维新，改八股为四书义策论，

^① 《书鄂闱文告后》，《申报》1902年9月7日。

^② 《科举文不宜用怪诞字面说》，《申报》1903年8月12日。

^③ 姚公鹤：《上海闲话》，第132-33页。

^④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香港大华出版社，1981年，第135页。

^⑤ 高风谦：《致汪康年》（三），《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613页。

并且在城里也办起新式的学校来。但我还是依然跟着八股文先生在私塾里学习四书义策论，预备每年冬季应秀才的考试。”先生事忙，无暇过问学生的功课，“因此每天跟着几个年长一点的同学在街上乱跑，从书店里看到《新民丛报》、《浙江潮》一类的杂志，感到新奇，便买了几本来瞎七瞎八的阅读，后来读上了瘾，模模糊糊地知道一点世界大势，觉得非懂一点外国文或到外国跑一趟不可。”^①同时，读书人也主动求变。杨度日记中就显示，“废除八股”对他来说就不是什么问题。1898年8月2日记：“晚，与林、刘两师爷赴傅太守约，见改试策论上谕，举十得五，自以此为选举之正，然先史事、时务而后经术，则知一而未知二。盖唐宋以来，已难言之。至谓八股不必废，则蓼虫忘辛之论矣。”为此他也赶紧有所动作：“数日专寻书肆，买洋务书数十种，将以为赋料也，终未得备。”^②只是购书的结果，未必如其所愿。朱峙三日记集中反映的是1901、1902年的情况，表明应试士子如何设法获取新书，以应对撰文之需。日记中留下这样一些记录，“下午由袁夏生借到郑赤帆所购时务新书，如《中国魂》、《新民丛报》之类，精神为快，可以开文派又一格矣。”选择这些资料，原因正在于，读《新民丛报》、《中国魂》之类，“习其文体，是为科举利器。今科各省中举卷，多仿此文体者。”^③朱所借阅的书还包括《瀛寰志略》等新地理书，并购买了《时务通考》一部，“《时务通考》阅竣三分之二，略知外国情况。”^④

1905年废除科举，是一段历史的终结，实际上从根本上摧毁了“士”这一阶层。失去原来依凭的士子，寻求新的路途，便成为可能的选择。如何确立读书人在现代社会新的角色与身份，不可避免成为走出科举时代的学人思虑的焦点。在报刊的影响已无处不在，甚至读报章已成为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的情形下，读书人在学业养成阶段受到所读报章的影响，也有太多例证。不宁唯是，在

^① 章锡琛：《从办学校到进入商务编译所》，收入《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我和商务印书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94页。

^② 北京市档案馆编：《杨度日记》，1898年8月2日、8月16日、12月27日，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102-104、116页。

^③ 《朱峙三日记》（连载之一），《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0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35-37页。

^④ 《朱峙三日记》（连载之二），《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1辑，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98-99、306页。

读书人的自觉中，还把创办刊物明确定位于与“国家”、“社会”发生关系之始。梁启超在一次演说中就明确表示：“鄙人最初与国家发生关系，即自经营报事始。”而且，“对于他方面，有脱离者，亦有中断者，惟对于报界，始终无脱离或中断之时，今后且将益尽力于是焉。”^①此外，为报章撰文以解决其生计问题，过上体面的生活，也是新式读书人可能的选择。甚至可以说，报章之于读书人，不仅是与社会发生关系之始，还构成其晋升的阶梯（当然只是阶梯之一）。^②

V. 余 论

近代报章之登陆中国，即构成传播西学的主要载体，凸显出鲜明的“学”的色彩；晚清民国时期，这一属性仍未改变，成为推动近代知识成长的主要媒介。因此，检讨报刊媒介如何构成新学之载体，对于近代知识的成长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似乎是颇为必要的。前已述及基于西方视野对新型媒介的评价，实际上这也构成民国时期的读书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吕思勉在检讨“三十年来之出版界”（1894-1923）的一篇文章中即曾言及：“三十年来撼动社会之力，必推杂志为最巨。”^③胡道静也撰文说明，“在最近一世纪的时间中，新闻事业对世界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所起的作用，可谓无物堪于伦比。”尤其指明，其“受了近代精神与物质文明的洗礼，而完成为指引时代前进的灯塔。”^④曹聚仁还曾立足于此具体分析了“文坛”：“一部晚清中国文学史，从侧面来看，又正是一部新闻事业发展史。”而且，“中国的文坛和报坛是表姐妹，血缘是很密切的。”^⑤也许问题并不如此单纯，但指出文学发展与报章的密切关联，提示我们注意近代学术的成长对于新型媒介的依赖。这里也试图说明，与“学”的结合乃晚清以来报章成长的“生意经”，到民国时期，当“大学”成长为学术重镇，更影响着报章的“生

^① 梁启超：《对报界之演说》，《东方杂志》第14卷第3号，1917年3月。

^② 这里无法展开，参见章清：《民初“思想界”解析——报刊媒介与读书人的生活形态》，《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3期，第1-25页。

^③ 吕思勉：《三十年来之出版界（1894-1923）》，收入《吕思勉论学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87页。

^④ 胡道静：《新闻史上的新时代》，世界书局，1946年，第11页。

^⑤ 曹聚仁：《文坛五十年》，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第8、83页。

意”，不仅发展出纯粹言“学”的杂志，知识分科往往还构成报章的主要栏目，相应的，学人也更为深入介入到刊物的创办中。

正如梁启超 1911 年在一篇文字中所表达的，“今世一切事业，大率分科发达。盖现象日趋复杂，而一现象之范围中，其所函愈富，而所造愈深。非有专门，不能以善其事也。即杂志亦何莫不然？今各国之名杂志，大抵各明一义，而对于社会之一部分事业，大有所靖献。吾国之杂志，虽有名作，而未足以语于是。或志欲为之，而毅力不足持于其后，方始趋进，乃嘎然中止。我国文物进步之所以濡滞，此亦其一原因也。”^①此一席话，揭示出晚清报章成长的脉络，可以说报章不仅构成“新学”的载体，而且对“学”的推进都反映在报章中。值得重视的正在于，“西学东渐”与近代报章的“援西入中”差不多是同步进行的，两者之结合也成为可能。来华西人对“西学”的引入借助于报章这一媒介，中国士人也借助于报章阐述对“学”的理解。换言之，晚清对“学”的阐述，乃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需要基于特定的社会背景才能理解报章何以扮演着令人意外的角色。这既是来华西人将报章“援西入中”导致的结果，也是晚清士人认知“西学”的结果。

用不着特别指明，所谓“西学东渐”，对“西学”的介绍绝非仅仅依托于报章，我们也熟知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以及广学会、益智书会等出版机构在传播“西学”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这里之所以要强调“报章”之意义，乃是因为“报章”不仅成为传播“西学”的重要媒介，而且阅读“报章”也是读书人接触“西学”的主要途径。在晚清所出版的诸多西学“汇编”资料中，往往都列有“报章”一类，从报章中辑录了不少文字。这里要强调的是，部分是因为报章成为“学”之重要载体，相应的，晚清出现各种西学汇编资料中，“报章”也成为类别之一。这是将“报章”作为“西学”组成部分的重要体现。在文章的最后，对此也不妨略加补充，据此也可以更好说明不仅新型媒介对近代知识的“传播”与“生产”具有重要的影响，也构成读书人了解近代知识的主要渠道。

西学汇编资料的出现，也算中西交流进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构成晚清中国

^① 梁启超：《〈法政杂志〉序》，《法政杂志》第 1 年第 1 号，1911 年 3 月，此据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561 页。

“采西学”的写照。^①较早出现的如《西学大成》、《洋务丛钞》等汇编资料，并没有涉及报章，但以“书目”、“提要”等形式出版的各种汇编资料中，不少都列有“报章”的分类。梁启超1896年辑成的《西学书目表》，即颇为典型。在《西学书目表序例》中，梁说明其针对西书大致以这样的原则进行分类：“译出各书，都为三类：一曰学，二曰政，三曰教。”除教类之书不录外，其余诸书分为三卷。上卷为西学诸书；中卷为西政诸书；下卷为杂类之书。^②下卷所列“杂类之书”，包括游记、报章、格致，显是梁感到难以取舍的部分，“总曰西人议论之书，曰无可归类之书。”在这样一个“分科”书目中出现“报章”一类，也是令人困惑的（“游记”、“格致”亦然）。不过，内中列出《中西闻见录》、《西国近事汇编》、《格致汇编》、《万国公报》、《中西教会报》、《本年西国近事》等报章，不难理解梁的用心。这些皆为来华西人所办报刊，也是传播西学重要的载体。在这个意义上，尽管在西学书目中区分出报章未必合适，与其它基于学科的分类也格格不入，但从“采西学”的角度来说，又很恰当。看得出，梁启超对报章之作用还是充分肯定的，他对《格致汇编》的评价，就特别提及其“多有出于所翻各书之外者”，言下之意也表明报章在西学传播上自有其特别之处。^③

继梁启超《西学书目表》之后，1899年徐维则所辑《东西学书录》，同样也富于影响。该书计分31门，与《西学书目表》相比，可谓大同小异。该书不仅同样列有“报章”一栏，而且更明确肯定报章在传播西学中占据独特地位。徐在序中即表示：“声光化电诸书中译，半为旧籍，西人凡农矿工医等学，每得新法必列报章。专其艺者分类译报，积久成帙，以饷学者，最为有益。”因此，“欲知各国近政，必购阅外报，英之《泰晤士报》及路透电音，日本之《太阳报》、《经济杂志》，于各国政要已具大略，盍仿西人传单之法，排日译印，寄送各官署兼

^① 参见章清：《晚清西学“汇编”与本土回应》，《复旦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② 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序例》，《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122-26页。

^③ 何以选择这些报章，梁启超在《读西学书法》文中有进一步说明。见梁启超《读西学书法》，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下册，第1167页。

听民间购买，以资阅历。”^①这里即说明报章除传达政情，还体现在提供了更新的知识。《东西学书录》一书，后由顾燮光补，改名《增版东西学书录》。1902年出版时顾另写了识语，也特别提到报章在西学传播中扮演着特别的角色：“兵家言南洋公学译之，商务书江南、湖北两商务报译之，格致学《汇报》、《亚泉杂志》译之，农学则《农学报》译之，工艺则《工艺报》译之，蒙学则《蒙学报》译之。此数种近日皆有译本，其东西政治、历史，则上海近多设编译局，皆有译者，惟矿学、医学两种，甚乏新译，富国强种，均当务之急，有心人盍起图之。”^②顾燮光后来还编有《译书经眼录》一书，该书是继《东西学书录》而作，“著录各书由前清光绪二十八年至三十年止”。在该书《自序》中，顾即表达了这样的看法：“留东学界，颇有译书，然多附载于杂志中，如《译书汇编》、《游学汇（译）编》、《浙江潮》、《江苏》、《湖北学生界》，各类考其性质，皆藉译书，别具会心，故所译以政治学为多。”^③充分肯定报章在介绍“东学”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黄庆澄所辑《中西普通书目表》，列有“西学汇刻紧要书”，也特别提到《格致汇编》乃“西学之渊薮也”，还指明“各种报章”、“各种游记”也当参考，“报章游记，无论佳否，其中必有扩人闻见处，最宜多备。”^④

报章在晚清被接纳，可以有多重的视野加以考察，各种“经世文编”资料即是值得重视的一个窗口。“经世文编”同样作为资料之汇编，与“西学”汇编资料，正可以结合起来加以审视。重要的还在于，“经世文编”有其特殊性，阅读范围更为广泛，是晚清读书人普遍接触的文本，更能反映晚清社会对报章普遍认知的情形。自晚清至民国初年，曾有多达20余种的“经世文编”相与赓续。这一现象的出现，固可说“经世致用”思想已深入人心，同时也是因为对“经世”之理解，代有不同。因此，经世致用思想既是中西思想沟通的重要津梁，各种“经世文编”资料，也成为审视西方知识如何被接引的重要维度。近代意义上的报章

^① 徐维则：《序》（光绪二十五年正月），徐维则辑、顾燮光补《增版东西学书录》，见前引《近代译书目》，第27-28页。

^② 顾燮光：《识语》，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徐维则辑、顾燮光补《增版东西学书录》，见前引《近代译书目》，第30页。

^③ 顾燮光：《自序》，见前引《近代译书目》，第401-402、591-592、661-662页。

^④ 黄庆澄：《中西普通书目表》，署“光绪戊戌七月算学报馆自刻”，1898年，第12页。

之被接纳，也可据此加以考察。用不着特别指明，最初的“经世文编”资料并无取自“报章”的信息，但到19世纪末所产生的各种资料，就不乏这方面的信息。邵之棠编《皇朝经世文统编》，计102卷，选文自清初至光绪二十七年，主要是道光以后诸朝的，共2481篇，在各种经世文编中，是收文最多、内容最广、子目最细的一种。其中卷十五“文教部”十五有“报馆”一栏，收有多篇文章。^①这些辑录于报章之文字，单就标题即可看出斯时对报章之认识与定位。1898年陈忠倚所辑《皇朝经世文三编》，卷五十五为“邮政”（兵政十一），录有几篇文章，因为标明了文章的作者，我们更可以判断所收文字汇集年当时一批开风气之先的人物对此的主张。^②同年何良栋辑《皇朝经世文四编》，卷三十二为“礼政”，收有“会章”、“善举”、“报馆”三组文字，其中“报馆”收有《论官报》、《中国振兴日报论》两篇文章。^③伴随“经世文编”之“新编”出现，此前的编纂形式，尤其是“学术”、“治体”及“六政”的体例，也被具体的子目所替代。麦仲华1898年所辑《皇朝经世文新编》，在编辑体例上就有明显突破。梁启超在《序》中即称赞此书“多通达时务之言，其于化陋邦而为新国有旨哉”。^④其中卷二十一“杂录”，收有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谭嗣同《报章文体说》等与报章相关文字。此外，求是斋所编《皇朝经世文编五集》，^⑤甘韩所辑《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⑥也均收有论述报章之文字。重要的是，无论是对报馆的论述，还是辑录报章中的文字，均在上述“汇编”资料中得以呈现，多少说明报章构成晚清“采西学”重要一环；对于“报章”的意义，或许也有必要“另眼相看”。

略说报章作为新型传播媒介对于近代知识“生产”所产生的影响，或有必要说明的是，所谓“近代”意义上的传播媒介，绝不仅仅限于报章，新式书籍自也应当纳入思考的范围，而且，新书出版实际与杂志发行紧密结合在一起，不仅出

^① 邵之棠编：《皇朝经世文统编》，上海宝善斋，1897年；上海慎记书庄，1901年。

^② 陈忠倚编：《皇朝经世文三编》，宝文书局石印，1898年。

^③ 何良栋编：《皇朝经世文四编》，鸿宝书局，1898年。

^④ 梁启超：《叙》，麦仲华辑《皇朝经世文新编》，上海大同译书局，1898年，第1-2页。

^⑤ 求是斋编：《皇朝经世文编五集》，宜今室，1902年石印，“例言”，第1页。

^⑥ 甘韩编：《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商绛雪参书局，光绪二十八年。

版机构广泛发行杂志，杂志社也印行图书。尤其需要说明的是，如罗志田在一篇文章中强调了，如果报刊舆论在开通见识方面有这样的作用，则“物质层面的电报和铁路、轮船等或有着更直接的推动作用”。“这些新事物扩大了区域性事务的影响，使其得到跨区域的关注”。^①究竟哪一种因素更为“重要”或许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也难以做出简单的评估，这些因素原本即是共同作用的，不过这里倒提示我们注意对新型媒介的研究需要扩大视野，技术层面的因素也不可忽略。实际上，构成西方近代印刷业三大要素的石印法、铅印法、蒸汽机印刷等新式印刷技术在晚清传入中国，也构成对新式出版业的推动与促进。

重要的是，经历这样的洗礼，当时的读书人对于新型出版物所具有的作用，已形成较为一致的看法。《时报》1911年刊发的几篇文字对出版业就表达了不少期许。一篇文章就提出：“今夫文野程度，全视印刷物之多寡以为衡。欧美各国近数十年内所以进步如此之速者，皆由印刷物导之先河。”“未有印刷物不发达，而文明程度可以增进者”。^②另一篇文字则从“出版自由”立论：“文明国三大自由，出版居其一，是出版而得自由，固文明国之所应有也。”其真谛即体现在“有以表著其高尚优美之学说，发挥道德思想，阐扬政治精神，使一国士民之德行才艺，俱跃然于印刷品之行间。”^③还有一篇文字集中说明：“书业之盛，此足以谕教育之普及与学术之振兴”，“俾其文物声名为大地所仰企也。”^④在将出版业与“文野程度”相联系的同时，这些文字对中国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也多有检讨，反复追问“吾国每岁出版之物有几何？”通过《时报》登载的上述文字不难看出，经历晚清的发展，对于新型传播媒介所具有的指标意义，已成为社会的共识。对这些复杂因素的分析不是这里可以展开的，或者需要在别的文字中进一步讨论。

^① 罗志田：《天下与世界：清末士人关于人类社会认知的转变——侧重梁启超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第191-204页。

^② 孤愤：《论印刷物可觐文明程度之高下》，《时报》1911年3月9日，第1版。

^③ 指严：《论吾国之出版自由》，《时报》1911年3月16日，第1版。

^④ 惜诵：《论上海书业之变迁》，《时报》1911年7月31日，第1版。

(中文提要)

新型媒介与近代中国的“知识传播”与“知识生产”

章清(中国 复旦大学)

这篇文章主要讨论的是在晚清中国近代知识成长的关键时期新型媒介所发挥的影响，以此揭示“知识传播”与“知识生产”的作用机制。近代知识在中国的成长乃“援西入中”的产物，涉及两方面的基本问题：西方知识怎样“传入”？中国本土如何“接引”？两种文化相遇发生“域外”与“本土”的知识调适，本不难理解，我们也熟悉“本土”所体现的为学立场，无论是“西学中源”，还是“中体西用”，皆深刻影响“采西学”的基本方向。因此对于近代知识成长这一问题，也有必要从多重视野予以考察。本文之所以结合“媒介”展开讨论，原因正在于，近代知识在中国的成长恰伴随新型媒介的兴起；新型媒介与近代知识构成高度整合的关系，西方的经验如此，晚清中国也不能例外。尤其是内中所展示的“知识传播”与“知识生产”的作用机制，更值得检讨。知识的成长从来不会以一种简单的方式进行“移植”，传统的“发明”，以及影响知识成长的诸多因素，皆构成重要的环节。对此略加梳理，或能帮助我们更好了解晚清近代知识在“传播”与“生产”方面展现的特色，也有俾更好把握近代知识的特质所在。

I. “媒介的历史包含了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域”

如何评估信息传播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早已构成审视近代世界诞生重要的视野，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与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即是常被引用的范例。这里无意套用上述理论进行某种证明，但立足于“新型媒介”的研究视野，确有不少值得借鉴之处。对近代社会重大历史现象的分析，往往都绕不开

此。而如何开展媒介的研究，也存在多样性的看法。不管怎样，涉及到“媒介”自应有这样的自觉，“媒介的历史包含了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域”。本文结合新型媒介讨论近代知识的成长，自然须结合印刷、出版等机制展开。换言之，聚焦于新型媒介，正是试图揭示近代知识“传播”与“生产”与此的密切关联。实际上，中国士人接触“新闻纸”，即据此获得关于外部世界的种种“知识”；走向报章之创办，也致力于使之成为“西学”之“载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晚清出现之报章也可定位于近代知识“传播”与“生产”的主要“媒介”。

II. “新闻纸”所构建的“信息世界”

两种文明的沟通对“出版物”的依赖，再怎么估计都不为过，对比不同时期的文化交流，即可看清这一点。就传播知识的“媒介”来说，尽管耶稣会士也依赖于地图、仪器之类的新事物，但主要还是凭借“书籍”这样的“出版物”，当新一轮“西学东渐”的帷幕在 19 世纪揭开，情形便不一样了。报章杂志、新式学校及学会等制度性传播媒介大量涌现，这也决定了西学传播的程度较之以往不可同日而语。在中文世界最早出现的一批报刊，即成为传递“新知”的重要窗口，构成“知识传播”与“知识生产”的主要载体。在这个意义上，关注近代知识“传播”与“生产”的“场域”，也成为可能。这个“场域”既包含报章的编辑、印刷、发行所营造的“网络”；也包含报章之编辑、读者及阅报处所构成的“网络”。

III. 作为“知识”载体的报章媒介

用不着特别指明，晚清出版的报章其色彩是多样的，其发展也经历诸多曲折，并非一成不变。这其中，报章成为“书籍”的媒介，成为“知识传播”与“知识生产”的主要载体，即值得加以重点讨论。而且，重要的还在于，与书籍、书局相关的信息，往往都依托于报章这一媒介得以为更多人了解。甚至可以说，知识的“传播”与“生产”自有其“生意经”，报章的作用也甚为明显。晚清读书人走向报章之创办，与书籍的关联也愈益密切，并且在多个层面都有所体现。内容方面，一份报章往往会以连载的形式刊登相关书籍的内容，这还不是主要的，作为一份报章实际搭建起一个销售平台，不仅其自身发行的报章与书籍需要借助其他的报章或书局，同时它也为其他报章与书籍的销售，担当重要的媒介。

IV. 报章与科举考试的结缘

报章在多大程度上流通及阅读，往往与斯时的价值取向有密切关联，在晚清

不得不提及的即是科举改制的影响，不仅许多书籍、报章的出版原本即有科举改制的因素，之所以能为士人所接受，进入其阅读范围，也是由于科举改制的影响。科举改制的核心体现在“废除八股，改试策论”，所出“策问”不少是围绕西学知识进行，考生则需要根据所掌握的西学知识才能完成“应策”的工作，这一分针凸显出凡是与“西学”、“时务”密切相关的书籍与报章，皆成为士子可能的选择。在报刊的影响已无处不在，甚至读报章已成为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的情形下，读书人在学业养成阶段受到所读报章的影响，也有太多例证。

V. 余论

略说报章作为新型传播媒介对于近代知识“生产”所产生的影响，或有必要说明的是，所谓“近代”意义上的传播媒介，绝不仅仅限于报章，新式书籍自也应当纳入思考的范围，而且，新书出版实际与杂志发行紧密结合在一起，不仅出版机构广泛发行杂志，杂志社也印行图书。尤其需要说明的是，如果报刊舆论在开通见识方面有这样的作用，则“物质层面的电报和铁路、轮船等或有着更直接的推动作用”。究竟哪一种因素更为“重要”或许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也难以做出简单的评估，这些因素原本即是共同作用的，不过这里倒提示我们注意对新型媒介的研究需要扩大视野，技术层面的因素也不可忽略。实际上，构成西方近代印刷业三大要素的石印法、铅印法、蒸汽机印刷等新式印刷技术在晚清传入中国，也构成对新式出版业的推动与促进。重要的是，经历这样的洗礼，当时的读书人对于新型出版物所具有的作用，已形成较为一致的看法。